

● 苏沛

读史笔记

文史探索书系·柯灵 范泉 主编

读史笔记

苏沛 著

K 250.7

25

出版社



读史笔记

苏 沛著

责任编辑 郑晓方
封面设计 范一辛

文史探索书系

读史笔记

苏沛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排版

昆山亭林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4.875 字数76千

1994年8月第一版 1994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ISBN 7-80569-736-1/I·213

定价 4.80 元

沪新登字 119 号

前 记

这本小册子收集了两组文章，一组是关于戊戌变法运动的论文，一组是以阐述爱国主义为主旨的论文，如果问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那就是爱国主义这条线索，因为人们公认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

这次出版前重读一次，有一点感想略述如下。

长期以来，戊戌变法运动虽然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历史界有些同志对它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起的作用评价不高，有的认为这次运动是“要不得的”，有的认为是“徒劳无功的”，其主要论据是这次运动是一次改良主义运动，而改良主义“是一种很不光彩的政治思潮和政治流派”，戊戌“变法的历史作用具体表现在它以自己的失败证明了改良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换句话说，它仅仅为后代提供了失败的教训，而没有起任何积极的作用。这种观点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占有主导地位。近几年来，有些同志指出，将戊戌变法

运动称为改良主义运动并不妥当，因为改良主义这个概念有确定的含义，它是指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中的一种思潮，其特点是满足于眼前的局部利益而忘记了夺取资产阶级政权的远大目标，改良主义发展的结果会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导致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失败。而戊戌变法运动则是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对腐朽的清代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从其不反对帝制一点而言，也可以说是“改良”，但这个运动发展的结果削弱了清代的封建统治，引导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两者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阶级背景和政治斗争内容，结果完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其根本区别是：现代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无正面价值可言，而十九世纪发生的戊戌维新运动中的“改良”则有明显的进步意义。这个观点言之成理，虽然还有人不同意，但至今未提出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这是多年以来对戊戌变法运动所作的一次有力的“平反”。

但是，改良主义的帽子虽说可以取下了，而“改良”的帽子却仍然戴在头上。上面说过，维新派的变法可以称为改良，将他们同资产阶级革命派相比，也只能称作改良派，问题在于，在人们的观念中，“改良”同“不革命”、“不进步”、“革命不彻底”、“向统治阶级妥协”等概念相类似，有相通

之处，仍然是一个不光彩的帽子，甚至有反对革命的嫌疑。因此，在评价戊戌维新运动时，仍然要使它低于革命一格，仍然要批判它是“改良”。

现在不妨重新考察一下这个问题。

批判戊戌变法运动的“改良”，观点很多，略举两例如下：

有的文章说，维新派“提不出革命的理论和纲领，只是在不触犯地主阶级根本权利的基础上，求得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所谓“求得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就是承认当时连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都未具备（历史事实确是如此），更不用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了，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只有一些萌芽，尚未成熟，还未形成足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所有制形式，还不是社会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代表这种资本主义萌芽的政治派别也只能是具有萌芽的性质的特点。对这样的政治派别，要求他们提出革命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这个观点本身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

有的文章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只能由劳动人民来承担，包括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在内的资产阶级的努力和方案是徒劳无功的”。不错，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

EL40/10

务要由劳动人民来承担，这个任务是指资产阶级革命，或许还要加上无产阶级革命。可是，在戊戌变法时期，中国的劳动人民还未成长为自觉的工人阶级，还不能承担起这个历史任务，而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已经倾听到这个历史任务发出的信号而自觉地展开政治斗争，这种情况说明，维新派的斗争反映了客观历史的需要，我们有什么理由责备他们呢？历史发展不会停止，它不管工人阶级是否形成也要向前发展，而不会等待工人阶级形成以后再起步。我们不能因为戊戌变法时期还没有工人阶级参与政治斗争就认为维新派所干的事是多余的，也不能因为他们的政治斗争不可能取得最终胜利就认为这次政治运动“是徒劳无功的”，我们不能否认维新派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内起了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至于这个历史任务最终要经由工人阶级的领导才能取得彻底胜利，那是历史发展的另一个阶段的事情，而且没有理由据此来否定维新派的历史功绩。

以变法(改良)为特征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派别的出现表明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次运动的发展时期，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相比，在时序上有部分交错，但总的说来前者先于后者。它的政治思想一部分来

源于冯桂芬、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思想代表人物的著作，而这些著作大体上写成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如果以 1888 年康有为第一次上清帝书作为维新运动发创的标志，那末，它要早于兴中会成立（1894）十年左右。维新派的政治思想代表了当时中国内陆地区的先进分子对世界和社会的认识水平，而兴中会的纲领则代表了与欧洲文明有直接接触的香港、澳门、广州和华侨中的先进分子对世界和社会的认识水平。两类地区社会经济的发达程度不同，人们的认识水平也有先后的不同，也有差距，这是很自然的。当时的交通条件、信息手段很不发达，缩短这种差距需要时间。我们在一百年以后研究当时历史，如果以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达到的政治水平为尺度来衡量和评价维新派，或者以后来无产阶级政党所达到的政治水平为尺度来衡量和评价他们，显然是不公平的。革命派比维新派进步是个事实，但不能因此就说维新派不革命、不进步。如果把维新派的改良看作是一个不可超越的历史发展阶段，那就不存在革命或者不革命、进步或者不进步的问题。站在后来的革命的角度看，“改良”似乎是不进步的，但在维新派活动的历史时期内（1888—1898 年），革命条件（危机）并未成熟，即使在十多年后发生的辛亥革命，其革命成果也立即被清朝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

所篡夺。在那个时候，改变旧秩序的客观可能性只有改良，而存在决定意识，当时广大的中国内陆地区的先进分子的认识水平也只能达到改良的程度。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指出，维新派的思想是当时“最先进的思潮”，这个评价是恰当的，因为当时有学识的人当中绝大多数人的西方知识（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少得可怜，大学士徐桐甚至认为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根本不存在，都是英、法等国捏造出来吓人的。当稍后革命派的活动展开以后，当时的士大夫对孙中山的思想很不理解，视为空想，因而呼之为孙大炮。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思想在中国扎根，实际上已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后。从比较中可以看出，维新思潮确为当时时代之先驱。从维新派改良的内容和性质来看，他们不是向旧制度投降、妥协，而是主张对旧制度实行变革，不是将历史向后推，而是将历史向前推进。指维新派为改良之主要理由为他们不反对帝制，似乎在阻滞历史的发展，然而不反对帝制并不等于不反对封建制度，维新派控诉封建制度腐败积恶之文字，文情并茂，至今读之犹令人赞叹！维新派的政纲是建立君主立宪制度，这个政纲如果实现，也是以资产阶级专政代替封建地主阶级专政，达到推翻封建制度的结果。因此，维新派并没有阻滞历

史。

研究历史应当遵循历史主义原则，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个原则由列宁清楚地表述如下：“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个原理(α)只是历史地，(β)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列宁全集》第47卷，第464页）

然而，在研究具体的历史事件和过程时真正运用这个原则，又谈何容易！例如，历史研究中经常谈到某些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局限性问题，维新派的改良就是历史局限性的一种表现。这个观点当然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不承认过去的思想和活动有局限性，就等于否认历史有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等于否认历史在进步，等于否认历史上的思潮和与不同的思潮有联系的人物有先进和落后的区分。否认局限性本身就是反历史主义的，也是违反客观事实和实事求是的原则的。但是，同时应当看到，当我们说前人有局限性时，是用今天社会中的政治和道德标准来评价前人的思想和行为，是站在历史活动扩大后的立场来评价前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后人观察今人的思想和活动，也会看出今人的局限性。局限性只是表明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差异，这种差异有先进和落后的区分，而并无政治上的好坏和道德上的善恶的

区分。在历史研究中，从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出发，提醒人们要顺应历史潮流，站在进步的一方面，而不要复辟旧思想和旧制度，这是历史学家应尽的职责；将旧制度和旧思想移植到今天的社会中，企图使之复活，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将会碰得头破血流。但是，如果认为旧思想和旧制度在它们存在的那个时候就是反动的、不道德的，那也是违反历史主义原则的。正如我们自己不迷信鬼神，从今天的认识出发可以说古人的迷信是落后，但来看，不相信不能说他们迷信鬼神是要不得的。从他们的立场鬼神才是要不得的。那是已经逝去的历史现象，对今人才有一个要得或要不得的问题。

可惜的是，我们今天常常在历史研究著作中看到，在运用历史主义原则时，往往将局限性作为贬义词和批判性词句来用，将落后性和反动性混为一谈，以致实际上未能正确地论述历史。

以上所述，也是对本书中某些观点的自我反省。

对于阐述爱国主义的一组文章，只想补说一个意思：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过去因为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为了救亡图存，需要呼唤爱国主义，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今天虽然走上富强的道路，而列强环伺、虎视眈眈的外部环境并未根本改变，为了振兴中华，真正立足于强国之林，仍然需

要呼唤爱国主义，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在斗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苏 沛

1993 年 1 月

目 录

前 记·····	苏 沛 (1)
戊戌变法运动历史回顾·····	(1)
维新派的国家观念·····	(28)
张之洞与戊戌变法·····	(41)
戊戌维新中的光绪皇帝·····	(62)
清末维新派如何利用庸俗进化论··	(81)
圆明园被焚毁的背后·····	(111)
谈民族气节问题	
——兼论周作人的道路·····	(122)
看《望长城》杂感·····	(134)

戊戌变法运动历史回顾

清末戊戌维新运动，如果以 1888 年康有为第一次上光绪皇帝书为起点，以 1898 年 9 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终点，前后经历十年左右时间。接踵而起的是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每一次革命的规模都比上一次壮阔，提出和解决的问题都比上一次深刻，都更加接近中国的实际，取得了更大的胜利。人们的认识在斗争中一步一步地提高了，因而事后来看以往的政治斗争运动，难免把它的缺点看得多一些，把它的成就看得少一些，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多年来有些著作在评价戊戌维新运动的时候，往往对它在中国近代所起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有鉴于此，笔者不顾浅学，谨抒己见，以就教于博学。

继承和发展了早期维新思想

戊戌变法运动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出现的早期维新思潮的继承和发展。七十年代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冯桂芬、郑观应、马建中等人。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马建中的《适可斋记言记行》，是其代表著作。

维新派所提出的许多政治主张，在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踪迹。例如，设立议院的主张，就可以在《盛世危言》中找到。维新派的说法是：“今吾国有四万万之民众，大地莫多焉，而不开国会，虽有四万万人，而不预政事，视国事如秦越，是有民众而弃之。”^①“设议院以通下情也。……人皆来自四方，故疾苦无不上闻；政皆出于一堂，故德意无不下达。”^②《盛世危言》中的说法则是：“故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Ⅱ（以下凡引自此书者均简称“资”），第238页。

② 《上清帝第四书》资Ⅱ，第176页。

万之众为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①两者相比较，不仅主张一致，连申述的理由也基本相同。又如，维新派认为变法必须从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入手。梁启超说：“今言变法必自求才始，言求才必自兴学始。”^②而《盛世危言》中说：“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③两者的观点和逻辑也是一致的。更值得注意的是，维新派在批判洋务派时，曾提出一个著名的体用不可分割、向西方学习必须兼学其体用的观点。这是两派在展开激烈的论战中一个交锋的观点。可是在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著作中也已提出过了。《盛世危言》初刊自序中说：“善夫张靖达公云：‘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移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道四达，果足恃欤！’”^④这难道不是对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点的非常有预见性的批判吗？

① 资 I，第 57 页。

② 资 IV，第 539 页。

③ 资 I，第 49 页。

④ 资 I，第 41 页。

维新派在继承中有发展。他们同早期维新思想家相比,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区别:(一)早期维新思想家虽然对洋务运动有所批判,但基本上是洋务运动的宣传者,他们的著作主要是为洋务运动提供理论根据,其中心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维新派则是洋务运动产生的对立物,在批判洋务运动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们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认为不仅要学西方的“用”,更重要的是要学西方的“体”;(二)早期维新思想家还没有脱离个人研究问题的范围,他们著书立说,发表个人政见,对社会影响较小,维新派则把书本上和口头上的议论变成实际的政治行动,他们直接向皇帝提出变法要求,并且发动了群众性的变法运动。他们组成了政治集团并且试图组织政党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纲领;(三)早期维新思想家一般是从富国强兵的角度来谈论变法,片断地、孤立地列举变法事项,强调向西方学习“船坚炮利,制造精奇”,虽然也主张设立西方方式的议会,但并未充分阐述“本”和用的关系,即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没有形成系统的、有逻辑的论述,维新派则从内忧外患的形势出发来说明变法的必要性,提出“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